

创业失败污名研究述评与展望

候亮, 孙珂, 丁桂凤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由于失败污名而减少的创业活动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然而很少有学者研究与失败有关的污名。从创业失败污名的概念及形成机制、失败污名的研究类别、失败污名所带来的结果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创业失败污名研究的进展,并提出了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展望,为深化创业失败污名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创业失败;失败污名;创业选择;创业者冒险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16)07-0074-06

污名(stigma)的概念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 E)在1963年首次提出,这之后社会学及心理学家以其对污名的定义为起点,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污名是对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不正常人的社会贬抑。这种异常特征可能是身体特征(残疾、丑陋)、行为类型(罪犯、同性恋者)、或者所属群体(宗教、国籍或种族)^[1]。行为规范是一个特定社会的共同信念,在某些环境下个体应该以一个特定的方式行动。当个体因某方面的缺陷或失误违反规范时,常常遭到社会主流群体的厌恶、歧视和回避,甚至排斥^[2]。传统上,社会通常把企业失败或破产归因于个人失败,例如过度消费、过度玩乐和对金融不负责任,据此对其产生污名态度和歧视行为^[3]。

失败是创业活动中重要的现象,会对创业者、企业和国家产生负面的影响。但绝大部分的早期研究主要强调新企业失败的原因、人们如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未来的创业过程中如何避免失败或提高新企业的存活率^[4]。近年来,国外学者们已经探讨了和失败有关的污名概念,失败污名能引发消极的媒体宣传和遭致严厉的批评,这些结果可能阻止了创业者再次创业,由于失败污名而减少的创业活动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作为在创业领域失败的这一群体如何被污名化及其带来的影响,国外学者们已经进行了研究,而国内鲜有此方面的研究文献,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国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不足及适合本土化的研究思路,为深化创业失败污名研究奠定基础。

1 污名的概述

1.1 污名的概念

污名一词最早是指希腊人画在身体上的标志来表示道德上的异常或者深度的名声破坏,它使个体处在忍受污名中,从一个平常的人变成一个侮辱性、贬低性的个体。20世纪初,Goffman将其定义为“让个体深受贬抑的一种属性”,使其在我们脑海中由“完整、正常的人”变为“有污点的、缺乏价值的人”,让其无法充分获得社会接纳^[1]。Link和Phelan认为,污名包括“标签、刻板印象、隔离、地位丧失和歧视”等元素^[5]。后来,Corrigan等又将污名的组成元素概括为认知(社会刻板印象)、情感(偏见)和行为(歧视)三个方面的内容^[6]。综上所述,污名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刻板印象,它使个体或群体拥有了(或被相信拥有)某些被贬低的属性和特质,这些属性或特质使被污名者产生自我贬损心理,亦导致了社会对其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

1.2 污名的维度

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区分了污名的类型和维度。Goffman区分出三种不同的污名类型:“身体的厌恶”代表受贬抑社会身份的身体特征,如各种生理缺陷、残疾、面部毁容、肥胖等;“个人特征的污点”是与人格或行为有关的被贬抑的社会身份,如心理障碍、监禁、吸毒、酗酒、同性恋、失业等等;“部族污名”包括种族、民族、宗教,这些污名是代代相传的,会涉及家族中所有成员^[1]。Dovidio等对应用不同维度区

收稿日期:2016-03-22

作者简介:候亮(1991—),女,河南周口人,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孙珂(1988—),女,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丁桂凤(1965—),女,河南焦作人,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管理心理学与人力资源管理。

分污名群体的研究进行归纳,得出 6 种污名维度,分别是“隐藏性、标记的变化过程、破坏性、美感、污名的起源、危险度”^[7]。Pinker 将污名分为三维度:深度、时间和距离,深度指的是个体意识到污名并接受它的程度;时间维度指的是污名持续的时间—永久的或暂时的;距离指的是被污名的个体和污名施加者之间的社会或空间距离^[8]。Goffman 是根据被污名者的异常特征或身份将污名归为三种类型,已有的研究主要具体探讨了这些污名群体;Jones 等人则是识别出了区分污名群体的六个认知维度,不同的污名群体在这六个维度上表现出具体差异;Pinker 的污名维度划分有助于理解失败污名在文化之间的差异^[9]。

2 创业失败污名的分类研究

创业失败污名是指创业者由于失败的创业遭致了社会群体对其消极的刻板印象,是污名施加者和污名承受者相互作用以及污名承受者内部心理能动的过程。目前,学者们已经展开了对创业失败的社会污名和自我污名及组织污名的研究。

2.1 创业失败的社会污名

社会污名是社会对其印象所持有的偏见和歧视,对于个人生活的许多领域有重要影响,例如收入、住房和健康^[5]。在社会水平上,创业活动随着文化和政策的不同,创业失败污名的程度也表现差异,这是目前失败污名研究的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学者们主要采取了文化的观点来审视污名,此类研究强调和创业失败有关的污名程度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例如,Begley 和 Tan 发现创业失败的污名在东亚国家比英国更受关注^[10]。Vailant 和 Lafuente 的研究表明创业失败的社会污名显著的阻碍了西班牙的创业活动^[11]。Damaraju 等发现污名对创业冒险的影响在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下有显著的差异,集体主义文化有更少的宽容、更大的失败污名化和较少的创业冒险的可能性^[9]。

第二个主题聚焦在用公共政策的观点来审视由于创业失败而导致的破产有关的污名。Efrat 的研究检验了美国公众对个体破产污名减少的原因,发现传统上财务失败被认为是过度消费或者欺骗造成的,随着失败变得更加被社会所接受,通常被归因于例如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缺乏福利和贷方绩效等因素。另外作者还发现媒体、政府和法律界在塑造对个体破产的社会感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媒体报道更多的破产实例,人们开始认为破产是常见的,并变得更加宽容;随着为破产服务的律师打出广告以及在一些

国家对破产者使用一些中性的标签,公众开始将破产看成平常的事,并开始容忍接受^[12]。Lee 等调查了世界各地的破产法律是否影响了创业发展的程度,通过使用来自 29 个国家的数据,他们发现更宽松和“企业家友好”的破产法和创业发展的程度显著相关^[13]。

2.2 创业失败的自我污名

Corrigan 等认为自我污名是个体同意并应用社会对其所持有的负面看法^[6]。至今,学者主要研究了创业失败污名的社会层面,对于失败污名对个体层面的影响研究较少。Singh 等利用了定性的叙事分析法进行了个体层面的研究,创业失败的自我污名探究了创业失败者怎样经历自我污名以及自我污名产生的影响,发现了两个模型:自我污名的消极影响和自我污名的积极影响。继而将自我污名的消极影响分为 4 个子模式:丧失信心、消极情感、对他人消极评价的恐惧、因失败感知到的排斥;自我污名的积极影响分为 3 个子模式:改变的原动力和为社会做贡献、从失败中学习的愿望、为在失败中采取的艰难道德决策而自豪^[14]。

创业失败自我污名的研究阐释了创业失败的负面标签和标签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揭露了关于创业失败自我污名的积极影响,这些发现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学者们更多地倾向于关注污名的消极影响,很少学者探讨污名产生的积极影响。目前,积极心理学已经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线,随之展开了大量积极心理学有关的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探索污名在个体和随后创业上具体的积极影响。

2.3 组织污名

组织污名是社会对组织的一种消极评价,是依赖于情景的,一种情景下导致污名的特征在另一种情景下则可能是中性甚至积极的。创业失败的组织污名,是一种在特定事件情境下产生的污名,例如破产、丑闻或经营失败,作为组织不当行为的后果,让社会大众产生不信任的一种消极社会评价。Devers 等在组织层面对污名进行的研究中,通过层次分析法在被污名的条件、预防和消除、普遍性三个比较维度上区分了个人污名和组织污名,并将组织污名定义为一种能使利益相关者认识到组织存在本质和深层的缺陷,从而将其去个性化并失去对其信任的标签^[15]。

组织污名既可源于组织外部,也可源于组织内部。Hudson 将组织污名区分为核心污名(core-stigma)和事件污名。核心污名是指组织因是谁、做什么、为谁服务等本质特征而被部分受众给予的消极社会评价。事件污名则源于破产、工业事故或明显的产

品缺陷等离散、异常以及零星事件^[16]。并且已有学者区分了被污名化的组织(堕胎诊所,破产公司等)和各污名组织成员(污名组织领导者)之间的区别^[16-17]。大多数创业公司是很小的,并且其问责制集中在管理层的手中,使创业者很难从他们的失败企业中撇清关系,因此,创业公司和创业领导者的污名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例如,Wiesenfeld 等认为污名是对企业高管的诽谤,由于他们和一个失败公司的联合^[18]。失败组织的领导者被认为是不适合的和无能力的^[17]。此外,失败污名对执行者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了社会耻辱^[19],因为他们也可能面临经济和职业机会的丧失,因此而避开企业界^[18]。

3 污名的形成机制

污名化过程包含承受污名者和施加污名者,当一个负面标签出现并形成后,就区分出这两类人。学者们已经对污名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提出了污名形成的机制及过程。Stanger 和 Crandall 在功能观点和生物文化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污名发展理论,他们认为社会污名的形成是一个社会互动和社会建构的过程,包括三个要素:功能、知觉和社会共享。社会污名最初由于其对个人或社会具有基本的功能而发展起来,随后,经由知觉过程而被人习得和强化,最后,因人们的社会共享而在文化上得以巩固,继而被污名者对社会评价的服从和认可,形成了失败污名的自我污名^[20]。中国学者管健提出了污名产生机制的过程,也阐明了社会污名到自我污名产生的过程,并以天津某辖区的农民工为例来揭示污名形成的过程和机制^[21]。

Devers 等概括了组织污名化的过程,从组织出现问题→个体标签过程→组织逐渐被污名化→集体标签过程→组织污名形成^[15]。一个组织被污名的导火索是该组织出现了违规行为(包括各种不合常规的、违法的行为),在污名形成过程中,一般会有先给个体贴标签后给集体贴标签的过程,只有在消极评价的受众达到临界规模时组织才会被污名化^[22]。

4 创业失败污名的影响

4.1 创业与失败污名

失败有关的污名对于创业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它不仅影响了成为一个创业者的决定,而且影响了项目的选择和终止项目的决定。大量的先前证据表明在欧洲和某些亚洲国家失败被高度污名化,然而美国的社会标准是更加宽容的,失败仅仅被看作是实验过程的一步。在美国内部也存在大量的差异,Saxenian 表明硅谷的创业者被表征为对失败有更多

的宽容,然而新英格兰则更为保守^[23]。

创业活动大体上随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变化,并且出现有关的失败污名。Landier 建立在失败的内源性污名上提出了两个平衡模式:保守型平衡(the conservative equilibrium)和实验型平衡(the experimental equilibrium)。创业者收到一个关于他们目前项目质量的信息,并且决定是否继续这个项目或者终止它来支持一个新项目,他们的决定依赖于开始一个新企业的代价,尤其是失败后的资本代价。在保守型平衡中,失败创业者面临高资本代价,因此优秀创业者不情愿去终止一个项目,由此产生了创业失败者的低质量合伙经营,反而证明是高资本成本。相反的,在实验型平衡中,优秀创业者更愿意再次开始,并且创业失败者的资本成本是低的。换言之,这两种类型的平衡由不同水平的失败污名所表征。在保守型平衡中,一个创业者的失败被更高的污名化并且损害了他的信用情况,然而在实验型平衡中,一个创业者失败后,他的信用市场(或就业市场)仅仅被轻微的恶化。因为失败付出较少的代价,在实验型平衡中的创业者愿意进行更多的进取成长策略,然而在保守型平衡中他们喜欢安全的项目^[24]。

4.2 污名和创业失败对创业者职业选择的影响

随着大量企业的倒闭和破产,创业者的再进入成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国家和制度压力影响着再进入决定。制度规范,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的文化价值,奠定了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动和由创业者创造的社会财富水平^[25-27]。因为制度规范所规定的合法性^[28],创业者面临着按照规范预期采取行动来获得所必需的企业资源的压力。因此,建立合法性的挑战是创业失败的主要因素^[29]。未能遵守规范期望使创业者受到负面社会判断的污名^[1],这导致了他们未来的创业活动遭到经济和社会的制裁^[24,30],继而系统地影响了企业家开始新的商业冒险以及从事风险活动的意愿^[31-32]。

在宏观层面上的污名态度如何影响那些在微观层面上被污名化人们的行为。具体来说,不同国家在对待失败创业者的负面态度以及对污名标志可见性的监管程度,影响了失败创业者未来的职业决策。每个国家的制度环境都是由正式的污名象征(明确的监管过程)和非正式的污名象征(隐含的文化规范)所组成的,它们的作用是储存和运输失败创业者信息给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Simmons 等就此提出了一个标志监管象征的污名对再次创业的调节作用理论(图1),理论的核心原则是被污名化创业者

的再入职业选择受制度压力控制个体污名对潜在利益相关者可见性的影响^[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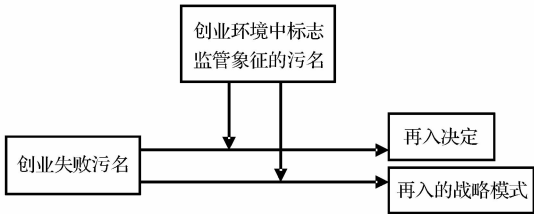


图1 标志监管象征的污名在创业失败污名和再次创业间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3]。

创业失败者将采取策略去管理污名和应对他们丧失的合法性。Simmons 等人对于 15 个 GEM 国家的创业失败者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污名态度和污名标志可控性水平上的跨文化差异确实影响了创业失败者去开始或推迟未来创业活动的决定,以及再进入方式的决定^[33]。

4.3 失败污名对创业者风险承担的影响

在许多社会和组织中,失败会遇到各种类型的惩罚。失败的人通常被称作失败者,导致他们自尊和自信的丧失。Stevenson 和 Jarillo 认为和失败相联系的消极结果,在个体的事业上对其创业行为有着破坏性的效应,被污名的人会面临许多问题,例如在社区中丢面子^[34]。组织中的个体会考虑在同事中的形象,因为害怕被嘲笑和丢脸,他们通常不愿意展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就是形象成本^[35]。在失败的创业者案例中,对管理形象和保持面子的担心是减少创业者承担风险的来源。附属于失败效应的污名可能不仅影响那些失败的人,也对那些期望从事风险活动的人有影响。

所有文化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创业失败的污名,然而,一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宽容污名。全世界的创业研究显示,通常个人主义文化比集体主义文化更宽容失败的污名,创业过程潜在地被理解对个人主义的追求,且个人主义的文化期望培养更多的创业。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一个人会追求实现自我或培养自己的判断,而不管社会趋于一致性的压力;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集体内的信念要比个体自己的更重要,“我们”这个概念支配着“我”这个概念。然而,环境动态性也可能对文化和污名与创业者冒险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重要的调节作用,在稳定的环境中,失败污名对创业风险承担有更不利的影响。关于污名在不同的文化和环境设置中对创业风险承担的影响,Damaraju 等

人第一次采用跨国的实证方法研究了失败污名对创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民族文化(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调节了污名对创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失败污名对创业风险承担有着更不利的影响。环境动态性没有直接调节污名和创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但是文化和环境动态之间的交互效应在个体主义文化子集中得到支持,但是在集体主义文化子集中没有得到支持^[9]。

在实证水平上,Damaraju 等提出了创业失败污名在不同的文化和环境背景中对创业风险承担有着不同影响的理论框架,整合了污名、文化、环境动态性和创业风险承担的文献,强调了采取综合这些观点和概念来理解失败污名以及它对创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方式^[9]。更重要的是当之前的文献对这些现象采取相当静态的观点时,这个理论模型捕捉了社会和环境的动态性质。

5 创业失败污名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污名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目前,对污名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都更加的丰富和广泛,研究结果也开始应用于实际生活,例如对污名的控制、消除和应对策略。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创业失败领域的污名,国外学者已经对其开始了相关研究,国内学者虽然已经展开了对创业失败的研究,但对于失败污名鲜有涉及。本文通过对国外创业失败污名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5.1 研究方向、测量方法更加多样化

基于不同的研究层面,创业失败污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目前,大量的研究积聚在社会层面上,很多国外学者从跨文化的角度和大背景环境的角度,来研究创业失败污名的影响,对个体层面的污名研究较少,以后的研究应更重视个体层面的质性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相对于其他较成熟领域的污名研究而言,创业失败领域污名水平的测量是限制失败污名研究的局限,根据 Armour 和 Cumming,在国家水平上,创业失败被污名的程度由破产法的严重程度所代替,这个严重程度是可以测量的,但是对个体水平的污名程度测量方法未来仍需研究者们关注^[31]。

5.2 对创业失败污名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

目前国外学者对失败污名的研究主要在社会水平的污名、污名对再创业、创业者风险承担、职业选择的影响,而对污名个体的具体影响、感知到的污名水平、创业失败污名的形成机制、失败污名应对策略等

方面,仍鲜有研究。未来研究应注重宏观和微观研究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污名的应对策略研究及消除污名方法的研究。

5.3 本土化研究亟待加强

我国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越来越重视自主创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对劳动力市场的拉动,开始大力支持和宣扬大学生及社会群体创业,而创业失败这一社会现象,也随之而来,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们已经从文化角度对失败污名展开了研究,但是此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及在中国社会大背景下污名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亟待学者们在中国文化下,研究失败污名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影响因素、影响方式和途径等问题。

5.4 问卷法和实验法相结合法

首先创业失败污名实质上是人们对于创业失败者的一种态度,内隐的态度可能更体现其真实性。所以通过实验法分析创业失败内隐污名状况,例如内隐联想测验,也许能够更好地测验到污名的真实状况。其次用问卷法和实验法探讨创业失败外显污名和内隐污名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仍待学者进行研究。

因而,从更广泛的角度,用多样化的方法和更有效的手段,对中国社会的创业失败污名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我国社会消减和降低失败有关的污名伤害、促进再创业成功的几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GOFFMAN E.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3: 1—10.
- [2] 张宝山, 俞国良. 污名现象及其心理效应[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6): 993—1001.
- [3] EFRAT R. Attribution theory bias and the perception of abuse in consumer bankruptcy[J]. Georgetown Journal on Poverty Law and Policy, 2003, X(2): 205—255.
- [4] 胡丽娜, 张骁. 国外创业失败研究综述[J]. 技术经济, 2012, 31(6): 60—65.
- [5] LINK B G, PHELAN J C. Conceptualizing stigma[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1, 27(1): 363—385.
- [6] CORRIGAN P W, MORRIS S, LARSON J, et al. Self-stigma and coming out about one's mental illness[J].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10, 38(3): 259—275.
- [7] DOVIDIO J F, MAJOR B, CROCKER J. Stigma: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M]//HEATHERTON T F, KLECK R E, HEBL M R, HULL J G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0.
- [8] PINKER R.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policy[D]. London;

Heinemann, 1971.

- [9] DAMARAJU N L, BARNEY J, DESS G. Stigma and entrepreneurial risk taking[C]//Opening up innovation: strategy,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y. London: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Business School, 2010: 1—37.
- [10] BEGLEY T M, TAN W L. The socio cultural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a comparison between East Asian and Anglo Saxon coun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 (3): 537—553.
- [11] VAILLANT Y, LAFUENTE E. Do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condition the influence of local fear of failure and entrepreneurial examples ove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J].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7, 19 (4): 313—337.
- [12] EFRAT R. Bankruptcy stigma: plausible causes for shifting norms[J]. Emory Bankruptcy Developments Journal, 2006, 22(2): 481—519.
- [13] LEE S, YAMAKAWA Y, PENG M W. How do bankruptcy laws affect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5): 505—520.
- [14] SINGH S, CORNER P, PAVLOVICH K. Self-stigmatis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C]//Full Conference Paper Submitted and Accepted in 26th ANZAM Conference, 2012.
- [15] DEVERS C E, DEWETT T, MISHINA Y, et al. A general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stigma[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1): 154—171.
- [16] HUDSON B A. Against all odds: a consideration of core stigmatized organiz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8, 33(1): 252—266.
- [17] SUTTON R I, CALLAHAN A L. The stigma of bankruptcy: spoiled organizational image and its managemen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7, 30(3): 405—436.
- [18] WIESENFELD B M, WURTHMANN K A, HAMBRIC D C. The stigmatization and devaluation of elites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failures: a process model[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8, 33(1): 231—251.
- [19] SEMADENI M, CANNELLA A, FRASER DS. Fight or flight: managing stigma in executive career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29(5): 557—567.
- [20] STANGER C, CRANDALL CS. Threat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tigma [M]//HEATHERTON T F, KLECK R E, HEBL M R, HULL J G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0: 66—87.
- [21] 管健. 污名的概念发展与多维度模型建构[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5): 126—134.
- [22] 张斌, 徐琳, 刘银国. 组织污名研究述评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3, 35(3): 64—72.
- [23] SAXENIAN A.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下转第 92 页)

154.

[36] 乐琦. 并购后高管变更、合法性与并购绩效——基于制度理论的视角[J]. 管理工程学报, 2012, 26(3): 15—21.
[37] 黄本多, 干胜道. 自由现金流量、并购溢价与我国上市公司

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09, 23(4): 139—143.

[38] 宋希亮, 张秋生, 初宜红. 我国上市公司换股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7): 111—120.

Review of Domestic Studies of Corporate Acquisition and
Proposition of a Research Model

YUE Qi, LI Jian-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ehavior occurred during the merger as a logical basis for the recent national study systematically comb. The study found: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pre-merger acquisition of motivation, the timing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arget selection carried out in three areas; acquisition proces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e acquisition payment, merger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transaction risk decision-making and acquisition process; while acquisitions after the study, the research focused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gration and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after the merg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China generally poor performance, especially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success rate is not high,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aspects of M & A performance prior acquisitions, and to explore how scientific decision occurred before the merger, including the right target selection, due diligence surveys and enhance bargaining power, such as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s well 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o enhance performance.

Key words: corporate acquisition;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resource-based view; institutional theory

(上接第 78 页)

[24] LANDIER A.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igma of failure [D].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2005.
[25] BAUMOL W J.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893—921.
[26] LEE S, PENG M W, BARNEY J B. Bankruptcy law an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a real options perspectiv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1): 257—272.
[27] CARDON M S, STEVENS C E, POTTER D R. Misfortunes or mistakes; cultural sense making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9, In Press, Corrected Proof.
[28] ALDRICH H, FIOLE C. Fools rush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industry cre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4, 19(4): 645—670.
[29] STINCHCOMBE A L.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M]//MARCH JG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5: 153—193.

[30] SCOTT W R. The adolescenc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7, 32(4): 493—511.
[31] ARMOUR J, CUMMING D J. Bankruptcy law and entrepreneurship[J].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2008, 10(2): 303—350.
[32] GIANNETTI M, SIMONOV A. On the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social norms,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J].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4, 11(2): 269—313.
[33] SIMMONS S A, WIKLUND J, LEVIE J. Stigma and business failure; implications for entrepreneurs' career choices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4, 3(3): 485—505.
[34] STEVENSON H H, JARILLO J C. A paradigm of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11(5): 17—27.
[35] EDMONDSON A.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learning behavior in work team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9, 44(2): 350—383.

A Review and Outlook on Stigma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HOU Liang, SUN Ke, DING Gui-feng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 China)

Abstract: Stigma of failure reduce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which is a great loss to the society. However, few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the stigma associated with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literature from the concept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tigma on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the stigma of research types, the results of stigma, discuss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tigma associated with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and put forward the deficiency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prospect for future research. Lay a foundation for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stigma associated with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stigma of failure; entrepreneurs' career choices; entrepreneurial risk-taking